

# 徐葆耕——清华精神的思考者

○ 程钢

敬爱的徐葆耕老师离我们而去了。这一切似乎来得有点突然。

从上大学开始，徐老师从未离开过清华，可以说是将一生贡献给了清华。徐老师中学时热衷于文学创作，原想报考中文系，圆作家梦，但在充满热情与理想的20世纪50年代，一部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使他改变了想法。那部小说使他认为，真正的作家决不应止步于舞文弄墨，从作家笔端流淌出来的，必须是其亲历的轰轰烈烈的人生。只有成为一个真诚的实践者，才可能成为好作家。于是，徐老师满怀着建设祖国水利事业的豪情考进了清华水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清华的几十年中，徐老师并非一帆风顺，既有喜悦，也有磨难。但对于这一人生路径的选择，徐老师很是珍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徐老师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清华精神的提炼、重塑结合在一起，投入于清华文科的复建、清华人文传统的弘扬、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事业中来。

或许可以这样描述徐老师的一生：文学爱好者——工科大学生——主张文理会通的人文学者。

我们今天怀念徐老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及其人文情怀，尤其是他对清华人文精神所作的深刻思考。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徐老师思想的一点理解。

## 一、对清华人文传统的弘扬

在清华文科复建之初，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看待清华历史上的人文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兴建了一大批工科大学，20世纪80年代后，这批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在这批大学中，有少数在历史上原有较好的文理基础，清华就是其一。因此，同样是向综合性转型，却有新建与复建的差异。徐老师很早就坚信：清华的历史决定了清华人文学科的重建要走复建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徐老师始终饱含激情，将清华文科复建与人文传统的重建相结合，使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近30年来清华文科是在“重建即复建”信念的深刻影响下自觉重建的。这一信念有一批支持者，徐老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徐老师喜欢引用贺麟先生的一句名言：“旧中求新方为真新”，我想这也代表了徐老师本人对清华人文传统的基本信念。

1988年，清华老学长王瑶（1937级）先生提出了饱含情感的观点：“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这成为“清华学派”一名的起源，徐老师则是最早投身于大力阐发、宣传、实践这一观念的学者，并促成了《清华文丛》的出版，丛书不设主

编，徐老师担任了执行编委（相当于主编）。这套丛书为清华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吴学昭（吴宓之女）《吴宓与陈寅恪》、吴宓《文学与人生》、《陈寅恪诗集》、王国维《古史新证》等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近20年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清华人文学术史的研究能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这套书功不可没。

在此过程中，徐老师自己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著有《释古与清华学派》、《紫色清华》、《清华学术精神》等书。其中，在《释古与清华学派》一书中，徐老师细致研究了陈寅恪、吴宓、王国维、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贺麟、王瑶等清华学人，弘扬与阐发王瑶先生提出的“清华学派”的理念，对“清华学派”融通中西的学术特色和历史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与评论。

## 二、大力提倡文理会通

在清华的众多人文特色中，徐老师特别关注清华的会通精神，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文理会通的新型中文系人才培养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之中。

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提倡：“于三者（按：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门）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



徐葆耕  
(1937~2010)

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水电专业。同年留校，历任中国革命史教师、校刊编辑、中文系教师。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贯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徐老师对这种会通精神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提出“文理会通，大师之道”。他在1997年4月的《光明日报》上提出：“如果说本世纪的大师产生于中西会通的话，我相信，新世纪的大师将产生于文理会通。”

对徐老师来说，“文理会通、大师之道”并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出自于他对清华学术史的体识。在徐老师的心目中，理想的大师既不抽象、也不遥远。它就体现在清华历史上的学术大师身上，例如赵元任。“近代物理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正是这种新的理念和试验方法给予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以强大的冲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突破，使得赵先生成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之父’。”

### 三、对于20世纪50年代清华精神的沉思

徐老师20世纪50年代考进清华，当时，清华大力提倡高昂的理想主

义，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弱势民众的深切同情心……这一切，对徐老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清华（特别是1952~1966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其间所蕴藏的教育之道，也是徐老师晚年不断思考的问题。可贵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徐老师的看法并不随时风飘移。

2009年，徐老师出版了一部新著《叩问生命的神性——俄罗斯文学启示录》。我拜读之后，第一感受就是，徐老师其实是用俄罗斯文学之酒，浇清华人心中之块垒。徐老师所说的“生命的神性”，既是俄罗斯文学的原有表述，也包含徐老师本人亲历的20世纪50年代清华理想主义的激情，是一种不满足于低俗格调的对生命理想与境界的追求。

在一系列相关的文章与著作中，徐老师自觉承担了20世纪50年代清华精神的见证人，通过叩问年轻时钟爱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小扣大鸣，为人们揭示了神圣人性的光彩，当然，其中也包括清华精神这一特例的特质（书中时有回忆与议论）。这种精神所提倡的奋发向上、追求理想、坚忍不拔的品质，令徐老师流连忘返。

什么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的人文精神呢？从徐老师对清华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徐老师对“烈火诗社”的回忆为例。1958年，《新清华》开办了《烈火》文艺副刊。其中，张应传的一首诗，徐老师几十年之后仍然提及。

“世界上最好的诗是用车刀在钢铁上写成的/世界上最动听的歌声是马达唱出来的/世界上最大快乐是劳动的幸福/让钢刀刮去我们思想中的污垢/让汗水洗去我们思想上的灰尘。”

在这首诗中，工程、意志、才情融为一体，生动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当时的清华人，凭着青春的理想与激情，在机器中窥见了“神性”。对清华人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生动而具体，它就体现在工程技术之中，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清华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我想，蒋南翔校长为学生文艺刊物的题词——“科学、劳动和优秀的文学艺术的密切结合，将能产生移风易俗的最伟大的改造力量。”或许是最形神兼备的概括。清华在1952~1966年间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其间的成功奥秘或许就藏在这段题词之中？

对于20世纪50年代清华精神的描述，不能不谈到徐老师对蒋南翔校长的评价，这寄托着他对清华的感情与认识。徐老师坚持认为，蒋南翔校长是“独具思想体系的”、“名符其实的教育思想家”。“蒋南翔……所达到的那个精神境界，是当今在商品大潮中俯仰浮沉的精英们所无法企及的。”

徐老师晚年对清华人文传统、文理会通的大师之道以及清华精神均有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真诚而深刻，这些思考，对于我们提炼、继承、弘扬清华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